

鉴书喻理与世事人情之相容兼得 ——介绍几则地方志藏书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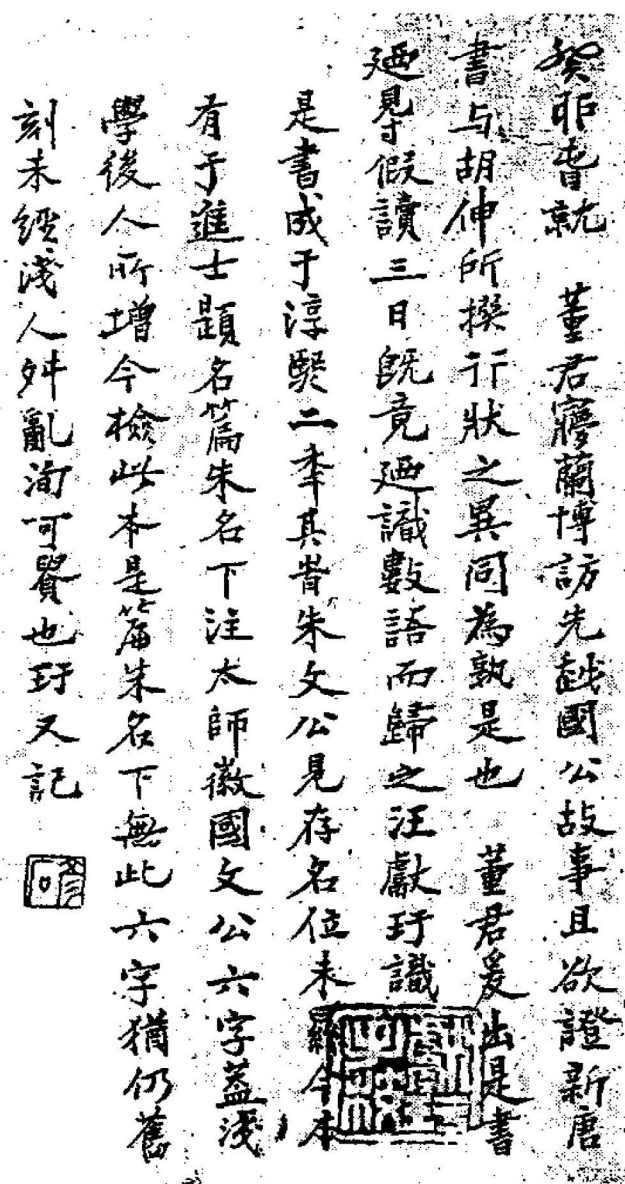
张 廷 银

在整理馆藏方志文献时,笔者得观几则清代、民国学者所留的藏书题记。这些或长或短的文字,不仅说明了某一文献的内容、刻印及流传情况,也反映了与刻印及流传相伴而行的世事与人情,是一个个生动具体的历史片断和一幅幅蕴含丰富的艺术画面。兹分别予以必要的介绍说明。

一、汪献玕题清刻〔淳熙〕 《新安志》(图一)

癸卯春,就董君梦兰博访《先越国公故事》,且欲证《新唐书》与胡伸所撰性状之异同为孰是也。董君爰出是书,乃得假读三日。既竟,乃识数语而归之。汪献玕识。

是书成于淳熙二年,其时



图一

朱文公见存，名位未显。今本有于进士题名篇朱名下注“太师徽国文公”六字，盖浅学后人所增。今检此本，是篇朱名下无此六字，犹仍旧刻，未经浅人舛乱，洵可贵也。珩又记。

〔淳熙〕《新安志》为宋人赵不悔、罗愿纂修，全书十卷。此志现存最早的刻本为康熙四十六年刻本，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有存。汪献珩题记的这部《新安志》刻印于清朝中晚期，今存于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题记中所云朱熹之名见于该志之卷八“进士题名”，在汪献珩所见该本中，于绍兴十八年进士名录中，有朱熹之名，但名下只注“婺源”二字。汪献珩认为这应该是最接近原书之真实状态。保持了这种状态的，还有国家图书馆所藏康熙四十六年、嘉庆十七年、光绪十四年刻本及清抄本。这就是汪献珩所说该书之“洵可贵也”。但是，分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和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的唐翰题跋抄本与延古堂李氏原藏抄本《新安志》，则删去了朱熹名下的“婺源”二字，而换成了“太师徽国文公”。

汪献珩（？—1848），字彦石，长洲（今苏州）人。自幼沉静喜读书，淡于科举，而以通经识字自励，曾从清代经学家陈奂研习诸经。著有《景许斋诗录》、《嗣安堂诗录》、《禹贡锥指节要》等。陈奂为其《禹贡锥指节要》作序时备极称赞之辞：“汪生彦石既善是《锥指》，乃依经立解，章别句从，言近乎雅，辞止以达，裁成简要，揉和一卷，以为家塾课童之本，善矣。”由其对《新安志》新旧刻本中关于朱熹身份表述的辨析，即见得他对经学及经学史之关切与熟知程度。

从汪献珩题记看，他从董梦兰处得以借读该书，落款“汪献珩识”四字处所钤“献珩手校”朱印，也强调说明了这一点。董梦兰，本名董兆熊（1806—1858），江苏吴江人，字敦临，一字梦兰。咸丰初举孝廉方正。工骈文。编著有《南宋文录》、《明遗民诗》等。我们不知他所拥有的这部《新安志》从何而来，又是如何转归陆心源

所有的，只是从书上钤盖的“光绪戊子湖州陆心源捐送国子监之书匮藏南学”、“前分巡广东高廉道归安陆心源捐送国子监书籍”等印看，该书在光绪丁未三十三年（1907）“皕宋楼事件”之前，就已于光绪十一年（1885）在浙江学政瞿鸿禨的鼓动下，捐送到了国子监，躲过了流落异域他邦的命运^①。陆心源所编《皕宋楼藏书志》和《仪顾堂题跋》，虽然都因其并非罕见而没有收录这部书^②，但在我们今天看来，实在是非常珍贵。因为在其藏传过程中，又蕴涵了一些非常具体的内容。

二、傅增湘《嘉禾志》 题记（图二）

嘉禾志，世传皆钞本，然展转移写，讹谬至不可读。此本经李实龢、唐端甫两君校过，李校出于别下斋，唐校出于冯孟亭，流传有绪，其改订因多可信，非夫专己自封而望文臆断者可比也。乙卯十月望日假读讫并记，傅增湘。

《嘉禾志》为元人单庆、徐硕修纂，共三十二卷。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现存《嘉禾志》的刻本分别有清朝道光、咸丰及清末沈氏海日精舍楼精校本，其余皆为抄写本，分藏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等处。但各目录中注明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四部只包含现藏于善

嘉禾志世傳皆鈔本然展轉移寫
可讀此本經李實龢唐端甫兩君校過
出於別下齋唐校出於馮孟亭
改訂因多可信非夫專己自封而望文臆斷者可比也
乙卯十月望日假讀讫并記
傅增湘

图二

本部的部分，而为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所藏三部抄本，则未予著录。其中之一，即是卷尾有傅增湘题记的这一部。

这部抄本《嘉禾志》，共8册。全书用两种字体的墨笔抄写，其一笔画瘦硬而略显涩滞，另一则笔画粗重却颇为流畅。天头地脚处的批校分别为朱笔和墨笔，且明显出于两人之手。笔者将朱笔批校与国家图书馆所藏唐仁寿（1829—1876）稿本《讽字室杂录》相对，发现两处笔迹极为近似，或许朱批即出自唐仁寿抑未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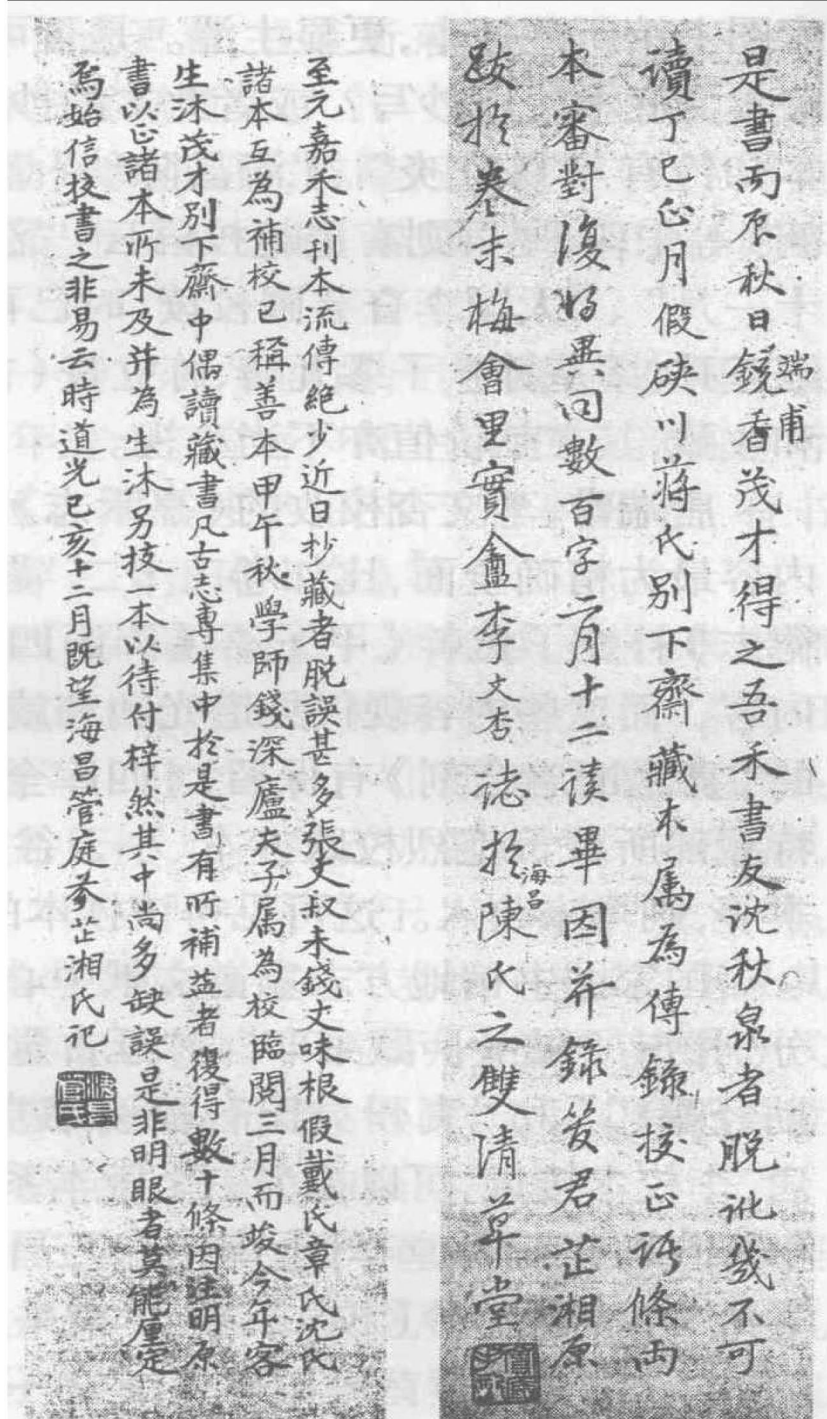
全书的首页用墨笔罗列了校勘者的姓名，计有桐乡冯浩孟亭、秀水沈叔埏双湖、嘉兴张廷济叔未、嘉兴戴光曾松门、秀水章金益斋、秀水钱聚仁味根、海宁管庭芬芷湘、嘉兴李文杏实龢、海宁唐仁寿端甫。接着是孟亭居士的墨笔识语：“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季秋，假得此本，与家藏京中抄本互校，人事牵扰，至戊申五月始校毕而归之，其中尚有缺误，未知将来更得旧本重校否？”从字体笔迹看，列举校勘者姓名及孟亭居士的识语为同一人所为，他或许是某位校勘者，或者是抄写者。书中的墨笔校改有“浩案”、“京本”、“松志”等字样，朱笔校改则多出现“张本”、“钱本”、“戴本”、“章本”及“芬案”等文字。据首页所列校勘者姓名，则该书最后的校勘者为李文杏和唐端甫。而第8册卷终又墨笔题到：“咸丰戊午二月以冯孟亭先生校本勘一过，其标京本者，其家所藏京中抄本也。十四日北窗下记，端甫。”另页则分别是管庭芬（1797—1880）和李文杏的朱笔校跋：

至元嘉禾志刊本流传绝少，近日抄藏者脱误甚多，张丈叔未、钱丈味根假戴氏、章氏、沈氏诸本互为补校，已称善本。甲午秋，学师钱深庐夫子属为校临，阅三月而竣。今年客生沐茂才别下斋中，偶读藏书，凡古志专集中于是书有所补益者，复得数十条，因注明原书，以正诸本所未及，并为生沐另校一本，以待付梓。然其中尚多缺误，是非明眼者莫能厘定焉，始信校

书之非易云。时道光己亥十二月既望海昌管庭芬芷湘氏记。
(图三)

是书丙辰秋日端甫茂才得之吾禾书友者，脱讹几不可读，丁巳正月假硇川蒋氏别下斋藏本属为传录校正诸条，两本审对，复得异同数百字。二月十二读毕，因并录管君芷湘原跋于卷末。梅会里实盒李文杏识于海昌陈氏之双清草堂(图四)。

跋语之后，又分别钤有“海昌管氏”和“实盒手记”的朱印，若跋语属于过录，那钤印又是怎么来的呢？是否抄写之后，复请管庭芬、李文杏先后加盖了印章？“陈氏双清草堂”是清朝三代阁老海宁陈之遴、陈元龙、陈世倌的私宅，李文杏与陈氏又是什么关系，竟然会在此处校书？这些问题，目前尚未得到确论。但不论怎样，可以判断这部《嘉禾志》就是唐仁寿（端甫）与李文杏（实盒）先后校读过的本子，而且各以冯孟亭和蒋光煦别下斋的藏本为校本，傅增湘先生的判断非常准确。但傅增湘先生的这则题记在其《藏园群书经眼录》和《藏园群书题记》中都未



图三

图四

见，是有意不收？还是漏收？

原杭州大学图书馆所藏清抄本〔至元〕《嘉禾志》（以下简称“杭大本”），其抄写的格式包括卷前所列校勘者姓名、冯孟亭的校语、唐端甫的校语以及管庭芬、李文杏二人的跋语，完全一致。所不同者：管庭芬、李文杏二人跋语之后，无“海昌管氏”及“实斋手校”朱印，之下亦无傅增湘氏跋语；文中朱墨二色批校笔迹比之国家图书馆所藏抄本，更显生涩。是否可以推断，其即以国家图书馆藏本为底本予以抄写？或者此本的抄写者书法略逊一筹？但杭大本却钤有“陈立炎”、“海昌陈琰”、“曾经艺风勘读”、“拾遗补阙”等朱印，尾页则有墨笔校语云：“江阴缪九畴书屏读，宣统庚戌十一月”、“太湖李沅芸圃校读，时己酉七月也”。^③说明此书曾经缪荃孙、缪荃孙从子缪九畴、陈立炎（古书流通处）等人（处）校读和收藏，其文献价值亦不当小视。

唐端甫、李文杏校改的《嘉禾志》，因迭经校勘补正，其文字与内容最为精确全面，比如卷三十二“题咏”中，唐、李校勘本据《崇德志》补充了黄幹《甲子语溪闵雨四首》、《喜雨用前韵四首》等内容，而这些内容现仅见道光间和咸丰间的刻本以及沈曾植校刻的《嘉禾旧志合刻》有保留，《四库全书》本以及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所藏黄丕烈校跋抄本、小云谷抄本、王振声、瞿熙邦校跋抄本等，则均未收入。这可见得该抄本的价值。

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所藏另两部抄本《嘉禾志》，分别钤有“结一庐藏书印”、“延古堂李氏珍藏”、“南陵徐乃昌校勘经籍印”和“真州吴氏有福读书堂藏书”等印，但文字内容与唐、李校本接近，可以视为一个版本系统。而曾先后为结一庐朱氏（朱伯修）、延古堂李氏、南陵徐乃昌等人收藏的抄本则在全书的卷末，还有两句抄（校）后语：“庚午春正假常熟赵价人民部所藏元刊本，倩休宁黄茵轩用硃笔细校一过”。这里的“元刊本”我们现在已无法看到，不知是否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的“嘉

兴路总管刘杰与郡官共刊行”^④之本？

三、曾习经〔乾隆〕《揭阳志》题记

此乾隆刻本，光绪年新会李坡樵星辉先生任揭阳教谕为续志二册，此修续志时重印之本，久存湖楼，其续二册未审借人，或先辈检书入行篋，偶漏存湖楼，使寄检也。坡樵先生绩学，经曾从学一年。续志视此更精，线装断落，癸亥中秋后一日命绮光重用线装并四册。蜚庵题记。

《揭阳志》由清人刘业勤修，凌鱼纂，乾隆四十四年（1779）刻印，全书八卷卷首一卷。而题记中所云这部〔乾隆〕《揭阳志》则系光绪年间的重印本。

题记作者曾习经（1867—1927），字刚甫，号蜚庵，广东揭阳县霖田都棉湖镇人。光绪十五年进士。曾官户部主事、度支部右丞等职，辛亥革命后隐居北京郊区。藏书甚丰，并长于版本研究。有书斋名湖楼。遗著有《蜚庵诗存》、《蜚庵文存》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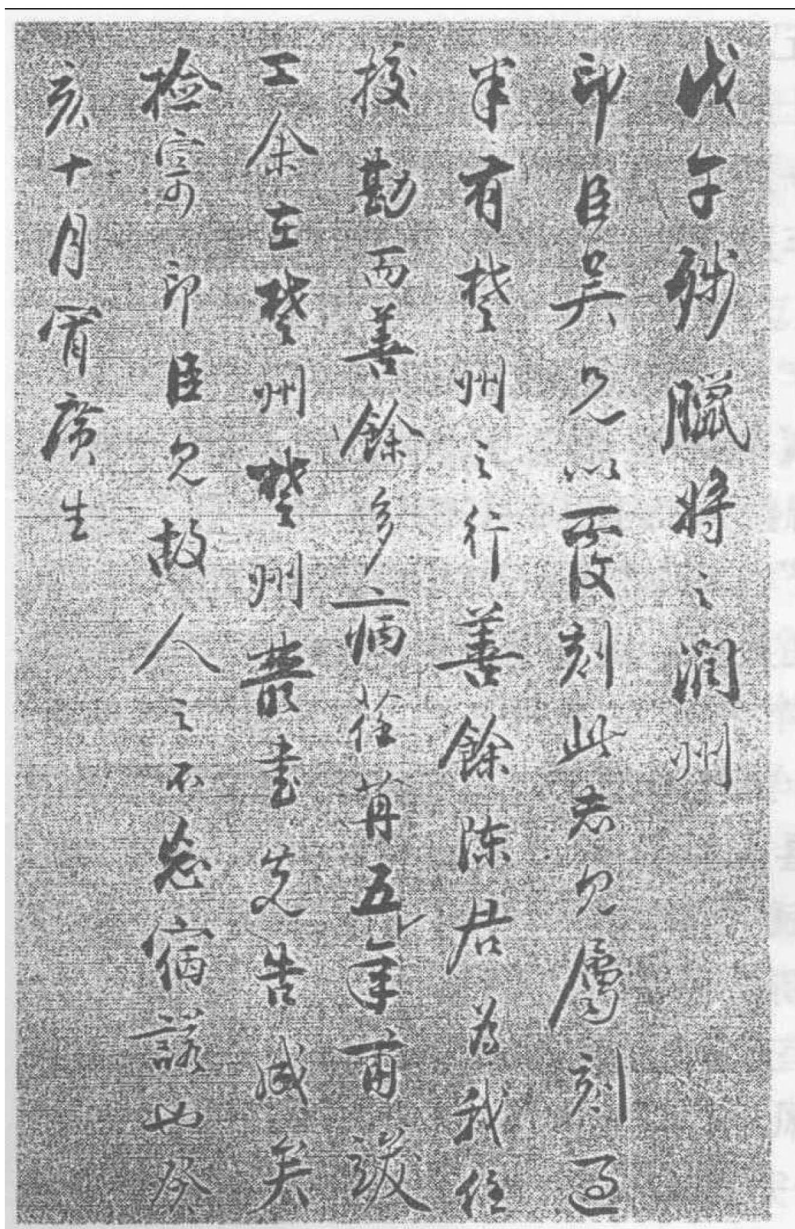
曾习经此处所云光绪间《揭阳县续志》，为王崧主修、李星辉纂修。李星辉，号坡樵，广东新会人，内阁中书衔，拣选知县。《揭阳县续志》卷二“职官”“教谕”一职之下，于“同治朝”先后注明：“李星辉，新会举人，十一年九月任，十三年正月赴京。”“李星辉，十三年会试后，八月回任。”“训导”一职下，于“光绪朝”又注明：“李星辉，十三年十一月以本学教谕兼理。”卷四“艺文”还录其《潮州怀古诗三首》、《揭阳县志续修自丁亥腊月始得采访录今戊子桐月大略编成计四阅月特赋二律以纪之》等诗作。除《揭阳县续志》外，本馆还藏有所撰《新会邑馆记》的拓本等。

《揭阳县续志》于光绪十三年始修，十六年付梓。正文分方輿志、建置志、职官志、人物志、风俗志、选举志、艺文志等七门二十九目，对前志的修订和补充十分完备，有关揭阳及邻邑道光末会党之扰攘、咸同间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等事件的记载，亦具有很高的资

料价值。这一切都体现了主纂者李星辉的文化素养和责任心。《揭阳县续志》分别有光绪十六年刻本和1937年铅印本，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皆有藏存。

曾习经称他曾经从李星辉而学，据有关材料介绍，曾习经于光绪十四年就读于广州广雅书院，那么他受教于李星辉的时间当在此前，又在同治十一年（1872）李星辉就任揭阳县教谕之后。

四、冒广生〔至顺〕《镇江志》重刊本题记（图五）



图五

戊午岁腊，将之润州，印臣吴兄以覆刻此志见属，刻过半，有楚州之行，善余陈君为我任校勘，而善余多病，荏苒五年，甫竣工。余在楚州，楚州丛书先告成矣，检寄印臣兄，故人之不忘宿诺也。癸亥十月冒广生。

此则题记见于〔至顺〕《镇江志》重刊本封面处，墨笔题写。内文共二十一卷，8册，朱印。纂修于元朝至顺间，由冒广生于1923年刻印。冒广生（1873—1959），江苏如皋人。光绪举人。历官刑部、农工商部郎中，民国财政部顾问，瓯海

关监督兼温州交涉员，镇江关监督兼镇江交涉员，《广东通志》总纂等职。后又为中山大学教授、上海文管会顾问等。以诗人、词家闻名于世。著有《京氏易三种》、《大戴礼义证》、《管子校注长编》、《蒙古源流年表》等，编有《冒氏丛书》、《楚州丛书》等。

题记中所及另一位重要人物吴昌绶（？—1918年前后在世），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别号印臣，著名刻书家。曾任光绪内阁中书，民国司法部秘书等职。著有《松邻遗集》、《吴郡通典备稿》等。在冒广生赴任镇江关监督兼镇江交涉员之职时，吴昌绶即以刻书家之兴趣与眼光，竭力鼓动他刻印古润州（镇江）的志书。冒广生既为镇江的父母官，便不能不为当地谋划，所以就接受了吴昌绶的委托。但实际的校勘刻印工作，则全赖镇江籍学人陈庆年来主持。

陈庆年（1862—1929），江苏镇江人，字善馀。著名学者、教育家。历任江楚编译局主办、江南通志局总纂、江苏学务公所议绅、湖南高等学堂监督、湖北译书局总纂、江南图书馆主办等职，并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长沙图书馆。深得张之洞、张百熙、张元济、缪荃孙、端方等人的赏遇。著有《春秋兵史》、《五代史略》、《通鉴纪事本末要略》、《两淮盐务志》、《西石城风俗志》、《横山乡人类稿》等。他在1921年9月30日致陈垣的信中，就指出了〔至顺〕《镇江志》、《北固山志》、《丹徒县志》等志书中关于镇江也里可温寺碑的记载^⑤，可见他对方志文献也是极为重视的。而作为镇江当地学者，他更关心《镇江志》的校勘与印行。他先后对〔嘉定〕《镇江志》和〔至顺〕《镇江志》进行认真校勘勒写，并曾写出了〔嘉定〕《镇江志校勘记》一卷^⑥。冒广生既负有吴昌绶的嘱托，当他了解到陈庆年已将〔至顺〕《镇江志》校写完毕正待刻版，便将下一步的刻印工作交给了陈庆年。但无奈陈庆年身体状况一直很差，1919年又得中风症，费力五年始完工。该书除卷首外，有正文十一卷，虽然只有卷首末页的版心处镌有“丹徒陈庆年善馀校字”，其他各卷卷终版心所显示的校字者则分别为丹徒柳肇庆、于

树深、陈杨杰、于念勋、陈浏湘、马庆堃、巢县黄利宾、如皋冒景玮等人，但我们似乎也从“丹徒陈庆年善馀校字”几字中，看到了陈庆年为完成冒广生的嘱托、为实践保存地方文献意愿而竭心尽力的情形。在此志刻印后的第六年，陈庆年就抱病而终了。冒广生在[至顺]《镇江志》甫印重刊本之时，即先检寄一部给吴昌绶，以示“故人之不忘宿诺也”。这话用在陈庆年身上，也是十分恰当的。中国知识分子完成弘扬和保存民族文化事业的过程，常常也就是他们实现诚信人格、彰显人文境界的过程。

对于这次很不寻常的[至顺]《镇江志》重刊本的刻印过程，冒广生在《重刊[至顺]镇江志序》里也有交待。但相对而言，序文主要体现了冒广生保存和传播镇江历史与文化的使命感，题记则反映了文人之间的珍贵情谊。只是我们现在还不太明白，为什么冒广生寄送吴昌绶的这部[至顺]《镇江志》重刊本上，却钐了傅增湘的“双鉴楼”印，而不是吴昌绶的“双照楼”印。

五、容肇祖《香山县志》题记

黄慈博先生赠与此书，惟缺首本，赖氏族一志未缺，特寄上。肇祖已托中山县友人搜觅此书，他日得之，当将首本寄上补完也。寄呈援庵师惠存。学生肇祖上。十月八日。

容肇祖先生这则题记见于该书之扉页处。国家图书馆现藏《香山县志续编》全志共十六卷，6册。容先生所见则为此志之残本，缺第一册之首二卷：卷一“图”及卷二“舆地”之“疆域”、“晷度”、“山川”、“都里”、“户口表”等。该志之第三卷为“舆地”之“氏族”。因为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为近代人文荟萃之地，出现了孙中山、容闳等一批很有影响的各界名人，记载这些名人产生背景的“氏族志”自然就具有很重要的价值。所以，容先生即以自己所得此本之“氏族志”未缺而为幸，并十分恭敬地呈献于陈垣先生。

陈垣先生和容肇祖先生，都是中国近现代文史大家，又同属广

东籍。而容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就曾选修过陈先生的“校勘学”课程,陈先生不仅在学业上给他以无私的指导,还在生活上给予热情的关怀,多次带他到家里吃饭,并将他介绍给著名的哲学家张荫麟。容先生毕业之后,又应陈先生之邀,应聘为辅仁大学国文、历史、哲学三系副教授前后3年^⑦。容先生在事实上与陈先生有很直接的师生之谊。容先生对陈先生的学问十分敬仰,曾经这样概括:“新会之学,白沙之于理学,任公之于新学,先生之于朴学,皆足领袖群伦,为时宗仰者。然白沙之学近拘,任公之学近浅,未若先生朴学沉实精密之不可移易也。肇祖心仪者盖在于是,而非苟为谀佞者。”^⑧陈先生对容肇祖也颇赏识,曾经以“粤中后起之秀,以东莞为盛”^⑨勉励之。不仅如此,他们两人对方志文献的价值也十分重视。1933年8月26日致陈垣的信中,容肇祖先答复陈垣寻觅《香山续志》的委托说:“前先生属为代觅《香山续志》,经托中山人回乡觅之,惟久未得复,大约需假以时日也。代借之《香山续志》,因借自中大,肇祖已离中大职,不便过于久借,如属缮录,尚幸督促记室早日成之,以便缴还耳。”看来此时他已为陈先生从中山大学借到了《香山续志》,正在想法为他寻购此书。而与此同时,他也在撰写《孔尚任年谱》,但遍读群书却不得其确切卒年,于是就想起了从方志中去寻找线索。所以,他在同一封信中又说到:“闻有新修之《山东通志》,又知先生藏有山东县志多种,《曲阜县志》此间不可得见,如值记室之便,钞示孔尚任传如何?”陈垣先生则给他指出了《兖州府志》续编中有孔尚任卒年的记载,容肇祖得到这个答案后,十分急切地回信说:“《兖州府志》续编有卒年七十一条,尤为肇祖所急欲知者。”^⑩当然,对于陈垣先生的嘱托,容肇祖也不能有所懈怠,所以他同时也写到:“《香山县志》前托觅之香山人已付之浮沉,经再托黄慈博先生,据云商之友人,有重复可让出者,迟数日或可交来云云。如觅得时,当即邮寄上也。”又过了差不多两个月即1933年11月18日,容肇祖再致信陈垣说:“《元典章校补释

例》，当以一册代赠黄慈博先生。肇祖前曾以《滇云历年传》一部，酬其赠《香山续志》之谊，不必再以他物为报矣。”^⑩看来，容肇祖此时已完成了陈垣先生的嘱托，那么，他将这部尚不完整的《香山续志》交给陈垣先生的时间，当在1933年9月24日至11月18日之间，或许就是容肇祖在题记中所注明的时间——10月8日。容肇祖请陈垣先生不必太以此事为意，也许是不希望先生有太多的负担，而陈先生坚持要回赠自己的著作，则反映了一位学者的崇高品德。我们现在还找不到陈垣先生需要《香山续志》的具体原因，但从《陈垣来往书信集》、《陈垣事迹著作编年》等材料中，看到陈先生曾经在1933年2—5月间因为新修新会县志之事，与新会县修志委员会有多次书信往来，他寻找《香山续志》是否与此事有关？

陈先生生前将这部来之不易的《香山续志》捐赠给他怀有深厚感情的北京图书馆，不仅是他个人的意愿，恐怕也代表了容先生的意愿。因为容先生在考入北京大学之前，就曾通过他的同学、时任松坡图书馆职员陈国桢，到松坡图书馆借阅英文书；在北大学习时，又师从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兼目录学教授后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的袁同礼先生，学习目录学知识；在辅仁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期间，“北京图书馆也尽力给予借阅与在内阅读的方便”^⑪。国家图书馆现藏有一部比较完整的《香山续志》，是民国19年（1930）香山县政府赠送的，也许陈垣先生当时未曾了解到这个信息。

题记中所及黄慈博先生即黄佛颐，亦为广东香山人，著有《粤洲公年谱》、《文裕公年谱》、《双槐公年谱》、《广州城坊志》、《广东宋元明经籍槧本纪略》等。

六、邓锜《蜀典》题记

润沅太史入都过泸，言在成都购此不得，书局久未印，适案头度此书，举以赠之。庚子四月六日，拙园识。

这是邓谔1900年为赠书与傅增湘（傅增湘字润沅）而题写的。邓谔（1872—1934）字守瑕，一字寿瑕，号忍堪、忍堪居士，又号拙园，室名荃簪余斋，又署荃簪余主人。四川成都人。民国后，历任众议院议员，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参议院参政。其女邓懿先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系和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后为著名学者、北大历史学教授周一良之夫人。

傅增湘是著名的藏书家，十分留意于收存各地的乡邦文献，尤其关注对蜀地文献的收集和编辑刻印，曾先后辑存刻印了《蜀贤丛书》和《宋代蜀文辑存》^①，又倾注大量的心血抄录四川的方志文献，如1928年12月20日给张元济的信就说：“目前急欲遍翻四川府县志，京馆存者不及半，涵芬楼中则尚完富，欲借则卷帙太多，无法运致，南来检抄，苦无此暇，且亦非数日所能了，奈何奈何。”^②其孜孜于乡邦文献之心情可见一斑。邓谔与傅增湘同年（1872）出生，同为蜀地文人，又同时参加民国约法会议，彼此有较深的交谊。邓谔《荃察余斋诗存再续》收有《傅增湘沅叔藏园校书图》一诗，其自订《荃察余斋年谱》也记，民国十九年四月八日，与傅沅叔、涂子厚同游暘台山，三宿于大觉寺。邓谔与傅增湘的交往情形如此，对傅增湘酷好四川文献之心情，想必也早已了解，并十分愿意成全他，于是就毫不吝惜地将自己案头之物送与友朋。而傅增湘得书后，也在卷端处恭恭敬敬地钤上了“傅增湘读书”的私印，可见他对此书的珍重。《论语》云：“君子以文会友”，此言不虚。

这部《蜀典》由清朝著名的学者、方志学家张澍纂修，刻印于道光十四年。全书共十二卷，有堪輿、人物、居寓、宦迹、故事、风俗、方言、器物、动植、著作、姓氏等十一类，是一部综合型方志著述。

注：

①光绪戊子十四年，陆心源在瞿鸿禨的多次劝说下，终于接受朝廷的奖赐，光绪诏谕他捐书有功，赏其长子陆树藩、次子陆树屏为国子监学正。大概

在此时，才在陆心源所捐的书上，钤盖了“光绪戊子湖州陆心源捐送国子监之书匱藏南学”、“前分巡广东高廉道归安陆心源捐送国子监书籍”等印。

②《皕宋楼藏书志》“史部”著录两部《新安志》皆为旧抄本，其中之一为丁小正旧物，还有方辅手跋。这两部抄本《新安志》在《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史部”“地理类”均有著录。

③据“宋集珍本丛刊”网站报道，傅增湘所藏明抄本宋人李之仪《姑溪居士文集》亦为李昉与缪九畴同校。

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十八“史部·地理类一”。

⑤《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1页。

⑥参见明光：《陈庆年和他的〈横山乡人日记〉》，《丹徒文史资料》第四辑；徐苏、严其林：《陈庆年生平及其学术成就》，《丹徒文史资料》第九辑。

⑦⑫容肇祖：《我的家世和幼年》、《容肇祖自传》、《容庚容肇祖学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⑧⑨容肇祖：1933年9月24日致陈垣函，见《陈垣来往书信集》，第270页。

⑩1933年9月4日致陈垣信。

⑪见《陈垣来往书信集》，第272页。

⑬徐雁平、武晓峰：《傅增湘对蜀中文献的收集与传播》，《四川图书馆学报》1995年第3期。

⑭《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牋》，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97页。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